

政言與法語

阮毅成先生兩部非文藝性的寫作

賴 景 瑚

一向以浙江才子著稱的阮毅成先生，由於台灣及香港的報章雜誌，經常刊載他那許多妙筆生花，斐然成章的文藝作品，人多知其擅長詩文，而幾乎忘記他是少年得志，飛黃騰達的從政者，又是曾在幾個著名大學講授法律課程的法學教授。

我們讀了他兩部問世已久，最近復經他修訂補充的「政言」和「法語」，就知道我的這位老友，不但學有專長，經驗豐富，而且精明強幹，才高識廣。無論在行政上、教學上、學術研究上，或企業管理上，他都做的有聲有色；而且到處都有卓越表現，顯著的成績。

以一專攻理工而對政治和法律都是門外漢的人，我實無評論此二書的資格。可是，毅成先生和我有若干相同之點。我們同在這個大動亂的時代生長，二人年齡相差也不多；幼時均抱「書生報國的願望」；及長，皆曾實際參加抗日及反共的工作。我們雖在抗戰前即已相識，但因服務地區不同，相見機會不多。直至最近幾年，我們才因「以文會友」的關係，常相過從；現又獲讀他贈我的這兩部書，更知道我們真可稱為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在「政言」那部書裏，蒐集他從教學時代到從政時代所發表的五十多篇文章，大約四十萬

言。那是從五四運動他才十五歲時起，持續不斷的寫了六十多年。舉凡他所親身經歷的或只從旁觀察的一切有關外交政治和浙江省政的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他無不有深入的分析，客觀的批判及精闢的論列。

「政言」共分三輯：第一輯論外交，第二輯評政治，第三輯談浙江省政和地方自治。他雖對外交講的很少，但對政治却講的很多，包括了政治改造、政治反攻、懲治貪污、行政改革和地方改革；真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談，而且又寫的那麼不蔓不支，淋漓盡致。

他的「法語」那部書，也有五十多篇，篇幅和「政言」差不多。全書分為五輯：第一輯是有關於法學和憲法的；第二輯是有關於民法刑法及國際私法等的；第三輯是有關於法治的；第四輯是有關於法制的；第五輯是有關於法律教育的。據他自己說，這不過是大概的區分而不是顯明的章段，因為有若干問題是互相牽連的。

阮先生本是浙江的法律世家。他的祖父在洪楊之亂後，習幕治民，曾在江蘇的阜寧主縣政。他的父親也歷任律師、議員、及行政工作，還辦過法政學校。他自己從十九歲到三十五歲，便不斷斷的學習、研究、教讀法律的學科，寫作法律

的書籍。他在留學法國的一段時期，也是以法律為專修科目。他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法學家。

他自海外歸來，雖先後在政治和教育兩方面服務；但正如他在「政言」自序所說的：「即使在從政以後，於法令的推行，不獨隨時探討，抑且用人行政，無不以勵行法治為己任。」他之所以出版「法語」這部書也是如他自己說的「我應當將自己對於法學的見解和心得，貢獻於讀者。」

阮先生對我國古代法學家楊子及法國近代法學家孟德斯鳩都很推崇。可是，他認為楊子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重視，而孟氏却對西方世界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孟氏的法學思想實已成為歐美民主法治的基礎。阮先生的志願，就是要喚起國人，大家努力於中國法系的復興和中國本位法律的建立。他一再強調中國要成為法治的國家，才能達到革命建國的終極。

政治和法律本來是分不開的。「政言」和「法語」雖然是性質截然不同，文字內容亦有相當差別的兩部書；但是我們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應該把這兩部書同時研讀和比照。我們寫書評，也未嘗不可以把它們同作綜合性的評估。我想原書及其書評的讀者，也不至認為這是不合理的事，甚至還會覺得這是融會貫通，順理成章的安排。

我的一位故友田錦燭先生是從政多年的法界耆宿。他逝世前數年讀阮先生的著作，曾說它把「吾國政治演進的情況，從北伐成功，統一實現，由軍政進入憲政起，以至抗戰勝利，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其間推行民主政治的措施，都扼要的言及；使人讀之，可以了解吾國民主政治如何胚胎、產生、發展，以及遭遇若何的阻力與困難。」這無異是為阮先生的著作，作了提綱挈領的敘述。

我們且看他自己對這兩部書的自我檢討。他說：「我自信我所寫的皆是我的論點與創見，并非抄襲成文，人云亦云者可比；且此中保存了若干史料，至為珍貴。」我認為這是很忠實而沒有一點炫耀氣味的評語。它可以說是和田先生所講的一樣的平實，一樣的客觀。聽說他還出版了好幾種有關法學的單行本。

事實上，阮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上面談到的那些書籍外，他還有不少其他寫作，包括法律、政治、行政、國際、外交、經濟、社會、教育、大眾傳播、文學、小說、傳記、散文、遊記、詩詞、藝術等等。照他自己的估計，他出版的單行本已有四十多種，單篇文章至少已有一千篇；總計字數，當在一千萬言以上。他文思敏捷，下筆萬言，尤其是他的寫作興趣，並沒有因年事增長而減低。這是最難得的。

阮先生在抗戰時期，一直在他桑梓之邦的浙江，從事地方行政的工作。在他還沒有升任民政廳長以前，他一度出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駐於金華。有一次，正當戰事緊張的時候，金華江

上的浮橋忽然斷了。這當然是關係戰爭勝敗和民生死的嚴重問題。他在一篇很精彩的文章裏，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

他說：「前方吃緊，大軍隨時要過境。後方疏散，車輛隨時要過橋。」他立刻動員人民，懸賞限期修復。就在那敵軍壓境，形勢危急的關頭，他自己「也赤了腳，穿了草鞋，頭戴草帽，身穿蓑衣，站在橋上督工；到了晚飯後，雨勢稍止，乃點燃火把，直到九時左右才告修復。」

我引用阮先生的原文，敘述這個十分動人的戰爭故事；一方面是要表揚作者在抗戰時的艱苦卓絕，和他那種負責而又認真的愛國精神；一方面是要把他當晚在那金華斷橋上和亡友許紹棣先生邂逅相逢時的情景，再用他自己的語言重講一下；也可以在我抗戰史上，保留一段可歌可泣而又極有意義的佳話。

許先生那時是浙江教育廳長。他也因戰事關係，乘車經過金華。他看見阮先生的那一身裝束，「於午夜猶在寒風細雨之中，乃下車表示慰勞，并問此係何地？」阮先生答稱：「這正是李清照詞中的雙溪」。許先生說：「國破家亡，天寒地凍，此橋此車，真是載不動許多愁也。」

李清照是才情卓越、顛沛流離的宋代女詞人。她也是走避外禍和戰亂，而由濟南流亡到金華；就是居金華時寫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武陵春」。其中便有「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又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許先生所講的那幾句話，使我既要憑弔那位文名千古流傳，命運又和我們相似的清照；又極懷念我們這位詩

詞清新典雅，逝世不到四月的紹棣。

阮先生和許先生在兵荒馬亂之時，還於慷慨激昂中，作此充滿詩情畫意的對白；這是難能可貴的書生本色。這也反映出「政言」和「法語」兩書的著作者，是能吏，是學人，是雅士。讀者不但可從那兩書中，得到許多有關政治與法律的史實和真理，也可同時很輕鬆的欣賞作者在文藝上的才華和造詣。

(七〇、二、廿三)

本刊歡迎

訂閱、批評、

投稿、介紹！